

李明天 著

新的蔷薇

XINDEQIANGWEI XINDEQIANWEI



新的蔷薇

李明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的蔷薇

李明天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2插页 104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0992-4/1·717定价: 2.05元

目 录

序.....严 秀 (1)

“时样”、时弊与时文

——代自序.....李明天 (3)

一九五九年

关于苹果的故事..... (8)

一九六〇年

论“脾气”..... (11)

一九六一年

子弹的眼睛..... (13)

一九六二年

胜败见英雄..... (15)

紧要处的几步

——纪念黄继光烈士壮烈牺牲十周年..... (17)

第一次..... (19)

一九六三年

坐车问题..... (22)

论生命..... (25)

两句《花木兰》..... (27)

一九六四年

“缩短距离” (29)

喝倒彩的消逝

——读《夏菊花》小感 (31)

一九六五年

前头与后头 (34)

一九七八年

从“听”电影说起 (36)

从两条腿谈到“六十四条腿” (38)

一九七九年

进城的联想 (41)

说“饭碗” (44)

一九八〇年

无花果与无果花 (47)

“识马·避路”与荐贤·让贤 (50)

由猪八戒识字想到的 (52)

从吃“苦”说到吃苦 (55)

从杨华得奖谈起 (57)

一九八一年

说“戒” (59)

有感于“我是共产党员！.....” (61)

竖鸡蛋之类及其他 (64)

“匾”挂出来之后 (66)

一九八二年

“声”的学问	(68)
新旧关系学	(71)
“得”与“德”	(74)
赞共产主义实践家	(76)

一九八三年

节奏、效率与“两个文明”	(78)
朱伯儒的“忧乐观”	(81)
从青年演员朴文化课说起	(84)
“杜康酒”的随想	(87)
“对号入座”生发出的感想	(89)
1:25的随想	(93)
不吹毛，而求小疵	(96)

一九八四年

关于“文山会海”的一得录	(99)
牺牲含义广狭论	(101)
丫环比小姐聪明能干	(103)
招风与挡风	(105)

一九八五年

万象更新	(107)
“人之初，性本善”吗？	(109)
戏人者的悲喜剧	(111)
人与虫	(113)
“物质胜利法”	(115)

“土”的思考	(117)
天安门前的感想	(119)
“红嘴绿鹦哥”与名、实、利	(121)

一九八六年

看相、验血与人体研究	(123)
珍贵的称号	(125)
“围墙”的兴衰	(127)
“天”的断想	(129)
作文与看文	(131)
移“山”填“海”及其他	(133)
眼睛的辩证法	(135)
数字里面的学问	(137)
人治与法治	(139)
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142)

——由《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

重视杂文想说的一些话

杂文与政治	(146)
设批评奖有感	(151)
“出力不讨好”析	(153)

一九八七年

当心赵公元帅的鞭子	(155)
浓缩文学的浓缩艺术	(157)
马谡之死的反思	(160)
“牛”“马”之争与宣传工作	(162)

不要女的与不要男的	(164)
-----------------	-------

一九八八年

导演赛跑、和尚挑水与人尽其才	(166)
----------------------	-------

杂文的生命	(169)
-------------	-------

后记	(173)
----------	-------

序

尸 秀

作者和编者多次命我为《新的蔷薇》写一篇序，我推却不得，只好在事务紧繁中日夜开工，读完了这部稿子。

我觉得这部稿子有不少优点，其中特别明显的，是文字通俗流畅，好懂。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向它学习的。

作者的文章，大部是在我军报刊上发表的，写法上自然会有所不同，便是把事情和意见直捷了当地写出来。这是一种写法，大家习称为思想评论。但这本书写的比较亲切，比起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某些思想评论的文章来，它具有明显的优点，就是不象那些文章那么“左”，那么板着面孔教训人，因此，我设想它的客观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这本书内容同一般的杂文集有很大的不同，它都是以正面立论的方式出现的，这当然是短篇评论的一种写法。这种写法有它的好处，就是开门见山，有何意思，一目了然。有些同志是很赞成并提倡这种文章的。这本书提供了这一类型文章的一个例子，可以供大家研究。

我还要再说一句，作者文章通俗顺畅，不矫揉造作，不故作高深，也没有庸俗、刻薄的语言，没有某些“杂文”喜欢用以装饰自己的陈词滥调。它真率、简洁，不作无意

义的肤浅化装，这确是它的一个明显优点。

我所盼望于作者的，今后是否可以在文章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力度上多做一些功夫，同时是否可以也写一些开拓民智、帮助解放思想、宣传改革与开放政策的文章。就是军中吧，正面教育当然是对的，但正面教育，今后恐怕也离不开改革与开放来说话。军中青年也有了大变化，他们大多会动动脑筋了，每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都有所承认、有所要求了，也希望别人考虑和承认他们这种要求。思想教育中处处设防的方式已经根本行不通了。我诚恳地希望作者今后能够在启发民智、开拓思维、勇于打破和抛弃某些过时的甚至有害的旧框框方面，再提供给我们更活泼、更开放、更勇敢和更有创造性的杂文集。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幸拜读到它。

1988年8月12日

“时粹”、时弊与时文

——代自序

李明天

我读文学作品是从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读鲁迅的作品是从读他的杂文开始的。读来读去，我爱上了杂文。

我试着写杂文，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从朝鲜战场胜利归国，对一个战士来讲，开始了新的历程，但在战争中，特别是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上甘岭战役中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常常撞击着我的心灵，欲放不下，欲罢不能。我决心把它写下来，但采取什么形式呢？我选择了杂文。

歌颂上甘岭精神，能不能采用杂文这一文体？我想。怎么不能呢？我又想。杂文是时文，是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映现实的一种文体。而我们的现实，既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痕污迹，又有时时刻刻在产生的代表时代潮流，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东西。“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而对于已产生的“新”，不是应该竭力予以支持，“助其一笔之力”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杂文既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

生存的血路”，又能为已产生的“新”铺出一条成长的坦途。就是处于鲁迅时代的鲁迅，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同时，也写下了歌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歌颂血洒刑场的先烈，歌颂人民革命斗争的篇章。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杂文“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震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歌唱”。

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下了处女作《关于苹果的故事》。而后，又连续写了几篇短文，或者以上甘岭的感受为由头，或者以上甘岭的事迹为素材，或者以上甘岭的精神为支柱，从一些侧面反映战士的神情、风貌。当然，这些“千字文”，不可能成为上甘岭的“全景文学”，但却记录了它的“一鼻，一嘴，一毛”。

回顾我的杂文写作，不论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这一阶段，还是从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有相当部分是针砭世俗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对新的人物的赞颂，其中有雷锋、朱伯儒、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部队的先进典型，也有其他战线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我以为：

就杂文的职能来说，应该承认它的主要职能是针砭时弊。杂文如同曲艺之中的相声，美术之中的漫画，是长于讽刺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别人对我说的一句话：

“人家是笔下生花，你们搞杂文的是笔下生刺。”殊不知，杂文作家的笔下并非“无花而多刺”，而是既生刺又生花

的，正象人们通常喻之为“带刺的玫瑰”、“无花的蔷薇”那样。我们不能象大观园里的爱哥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刺”障目，不见鲜花。杂文素来是最具战斗性和战斗传统的，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不是床头案边的小摆设。针砭时弊时，不留情面，锐刀割肉，一刀见血，可以说是它的“刺”（战斗性）；笔褒“时粹”（是相对时弊而言，指代表时代潮流的新的思想，先进人物，新鲜经验）时，旗帜鲜明，启人深思，激人昂扬，同样可以说是它的“刺”（战斗性）。这两者都能表现出杂文所具有的尖锐、泼辣的风格。

就歌颂与揭露的关系来说，要讲点辩证法，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在很多的情况下，一篇杂文既有歌颂的一面，又有揭露批判的一面，往往是激浊中有扬清，鼎新中有革故。我写《坐车问题》，是为了讴歌革命干部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高贵品质，颂扬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深情厚意，但围绕一个“车”字，同时讽刺了封建文人的落后意识，鞭挞了封建帝王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丑恶灵魂。我在写农村变化时，选择在围墙的衰落这一点上着笔，从有形的围墙联想到无形的“围墙”（因循守旧，萧规曹随，道学之道，市侩之理），有歌颂，有批判，从而指出围墙从兴到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歌颂与揭露批判这两者，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是相反相成的。扶正为了压邪，扶正才能压邪，即使揭露阴暗面，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无论是扶正还是祛邪，立新还是破旧，扬

善还是恶，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功利为转移，无论你“杂”到哪里去，都要达到一个标准：给予人以善（思想）的启发和美（艺术）的享受。

就歌颂性杂文的写作来说，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它绝不是一味歌舞升平的空泛之作，去粉饰太平，掩盖需要揭露的东西，而是“发聋震聩的木铎”，促人奋进的号角。那种认为歌颂性的杂文写不出什么味道的看法是片面的，写不出味道的有，写出味道的也不乏其例。陶铸同志写的《松树的风格》，就是一个范例。而揭露性的杂文，固然有写出味道的，但写不出味道的不也大量存在吗？有无杂文味道，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诚然，不能把歌颂性杂文写成表扬稿，功劳簿，也不能写成一般纪实性文学，就其取材讲，也要大中取小，在大量的先进事迹中找出它的“眼睛”来；就其表现讲，也要小中见大，从一言一行一感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广阔的社会意义。比如，我在写歌颂硬骨头六连的杂文时，开始文中列举了六连许多感人的事迹，但仍然有挂一漏万之感，后来忍痛割爱，只从一件具体事情——“听”电影说起，说明硬骨头六连所以成为硬骨头六连，就在于他们具有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高度纪律性，从而揭示战士的荣辱观。我在写反映官与兵、干部与群众关系的一篇杂文时，开始也写得很“泛”，搞成了一篇不长不短的评论文章；我不满意，又重新着笔，集中在人们的一句口头禅——“缩短距离”上，从各种距离的缩短，阐明这四个字是一种时代精神。从我写作

实践看，凡口子开得小，则易于挖得深；反之，口子开得大，面面照顾到，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事论理，则是十有十之失败。杂文是浓缩的文学，是事的浓缩，理的浓缩，情的浓缩，以及文字的浓缩。写杂文，就要学会浓缩的本领。叙事，不能过细，只能对先进事物作概括性的叙述；议论，不能是长篇大论，而是短篇“小说”，但必须注意说理的深度和回答问题的广度，以引发人们的联想；抒情，不能象小说、电影那样大书特书，但在字里行间要渗透着作者的感情。写歌颂性杂文，同揭露性杂文一样，都要有生活实感，钻在象牙塔里是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的。

在歌颂性杂文的写作上，目前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鲁迅的杂文，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报刊上发表的许多优秀作品，需要学习与借鉴。我仍处于试笔阶段，写下以上一些话，愿它能成为引玉之砖。“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很欣赏爱因斯坦讲的这句话。

关于苹果的故事

人们喜欢苹果，不是没有缘由的。它青里透红，清脆甜美，使人见之可爱，吃之可口。在作家的笔下，写了多少遍“苹果似的脸蛋”；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发生过多少个“苹果的故事”。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关于苹果的故事，是在《一千零一夜》里。说有一个人，他的妻子久病不起，他为了满足妻子的要求，冒着生命危险，从御园里偷来了三个苹果，苹果没有给妻子带来幸福，而带来了一场灾难：一桩人命案件。不足为奇，那是发生在大食帝国时代的阿拉伯。在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我们人民军队里，在这里发生的许多关于苹果的故事，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个苹果的故事，发生在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斗中。七连的战士，从坑道反击到表面阵地，已经是几天没有喝一口水了。干渴使人难忍，连长嗓子哑了，步谈机员嘴唇裂成一条条血缝，通信员嘴唇干得发紫，伤员的伤口在剧痛。运输员来送弹药，把路上拾到的一个苹果，送给了七连长张计法。给谁吃呢？谁愿意吃呢？八个人，你给我，我递你，传了一圈，完整未动。还是在连长的动员与带头

下，为胜利而“干杯”，八个人一人一口，又传了两圈，才把它吃光。

又一个苹果的故事，是登在《解放军报》上的。当我翻开报纸，一个苹果的插图，象磁石一样地吸住了我的视线。我一口气看了三遍。事情是这样的：五连战士韦崇高，在一次战术演习前买了六个苹果，一直舍不得吃，他打算在出击前分给大家，预祝大家出击胜利。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在冲击出发地，他把两个大的给了连长和指导员，把其余四个分给其他同志。

另一个苹果的故事，发生在福建前线某医院。他们收到了祖国人民许多的慰问品，其中有五个苹果。数目不多，礼轻意重，这是去年（1958年）11月间，朝鲜人民赠给我国的一批苹果，其中一部分分给中央邮电部，邮电部把分到的苹果赠给他们的下放干部，下放干部又送给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工人拿这些苹果来慰问福建前线部队，那个医院分到了五个。这五个苹果从朝鲜到中国，从后方到前线，经过许多单位同志的手，很不平常，因此，医院决定把这几个不平凡的苹果送给了战斗有功的休养员。

这一连串的苹果的故事，充满了多少友谊！同志友谊，官兵友谊，军民友谊，国际友谊，一句话，它生动而深刻地表明了：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故事里的每一个苹果，就是这种崭新关系的见证物。

发生在上甘岭的那个苹果的故事，是张计法连长亲口